

[主持人语]本期刊发四篇论文,分别讨论了尼泊尔佛塔曼荼罗造像、禅宗的本体精神、六朝时代气禁术的流变、《华严金狮子章》成书年代,涉及的地域和研究对象各不相同。张同标《尼泊尔佛塔曼荼罗造像考述》,把尼泊尔地区作为中印佛教美术传播的中间地带,结合佛教典籍,讨论了尼泊尔佛塔所表现的中印两国的佛像特征,补足了中印两国佛像源流与传播的部分缺失环节,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以汉语学术论文的方式对尼泊尔佛塔进行研究;丁小平《禅宗“呵佛骂祖”的真义》,论证了“呵佛骂祖”这样的狠辣手法,即要求修习者放弃一切攀附而亲见本性,直证真如而成佛,恰恰有着“成佛作祖”的佛教真精神;孙齐《六朝气禁术略考》,说明气禁术原先是东汉后期流传于吴越地区的巫术,经过葛洪的整理,被纳入了道教和医学的双重范畴,并在隋唐时期正式为官方医学所承认;袁大勇的《〈华严金狮子章〉撰著时间考》一一辨识了诸旧说,认定《华严金狮子章》的成书年代为699年或701年。

尼泊尔佛塔曼荼罗造像考述(上)

张同标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散布尼泊尔加德满都盆地的大量的石制佛塔,通常在塔身四方雕刻四方佛,按照右旋顺序,从东方起雕造阿閼佛、宝生佛、阿弥陀佛和不空成就佛,以佛塔自身作为大日佛的象征,共同形成金刚界曼荼罗五佛信仰系统。部分佛教也雕造了佛母、天王和护法忿怒像。这类佛塔在中国内地也多有表现,并可与中国汉译密教佛典相互照应。随着密教的进一步发展,在尼泊尔等地又形成了本初佛的概念,以佛塔自身象征本初佛,原先居于中间主位的大日佛反而退居于阿閼佛与宝生佛之间,位于佛塔的东南隅。类似的佛塔曼荼罗起源于印度,而极盛于尼泊尔,在中国西藏也有类似的造作,并出现在唐喀佛画中。尼泊尔的佛塔曼荼罗介于佛教美术从印度向中国传播的中间地带,也兼有中印两国的某些特色。

[关键词]尼泊尔佛塔;金刚界曼荼罗;五禅佛;本初佛

[中图分类号]B9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3)03-0040-12

He Buddhist Stupa Mandala of Nepal(1)

ZHANG Tongbiao

(College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s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Kathmandu Basin of Nepal has stone stupas everywhere. Except some large stupas such as Swayambhu, there are also many Votive stupas scattering in the streets and temples, which are carved with four-side Buddhas around. According to the Clockwise order, they are Akshobhya, Ratnasambhava, Amitabha and Amoghasiddhi. Together with the Great Day Tathagata, they composed the mandala five Buddha belief system. Some Bodhisattva, heavenly kings and Dharma are also carved. Similar stupas can be found in China as well, echoing with the Tantra Buddhist scriptures in Chinese.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antrism, the concept of Adi-buddha come into being, which was symbolized by the prime stupa. Samantabhadra, which stayed in the centre,

收稿日期:2012-1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江流域宗教文化”(11&ZD117);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佛教造像的古印度溯源研究”(12CGB004)

作者简介:张同标(1970-),男,江苏盐城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美术学博士,主要从事佛教美术研究。

then retired to the middle of Akshobhya and Ratnasambhava, and located in the south – east of the stupa. This type of stupa mandala originated in India and prospered in Nepal, and similar stupas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Tang hatem Buddha paintings in Tibet. Nepal's Stupa mandala is in the middle zone of the Buddhist arts spreading from India to China, and combine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Nepal Buddhist stupa, Vajradhatu mandala, Five – Dhyana – Buddha, Adi – Buddha

尼泊尔的佛教庙域和街头巷尾有大量的中小型佛塔,其主体部分的造型与著名的斯瓦扬布大塔(Swayambhunath Temple,俗称“猴庙”)相近。塔身四方四维雕刻佛像,除了个别年代久远的遗制,其他都属于密教曼荼罗体系。这些造像显示了某些一以贯之的基本特点:1. 佛像醒目地雕刻在塔身四侧,多为坐佛。按照右旋顺序,从东方起雕造阿閼佛、宝生佛、阿弥陀佛和不空成就佛,分别为触地印、与愿印、禅定印、无畏印。2. 佛塔是毗卢遮那佛的象征,与阿閼佛等四方佛,共同构成五佛信仰的曼荼罗系统。部分佛塔在东方同时雕造毗卢遮那佛的具体形象。3. 北方不空成就佛与那伽龙王的组合,可视为尼泊尔特有的造像风格,尚难探究其中的奥义。4. 部分佛塔出现了女尊造像、下方有怖畏像等,考虑到五佛信仰与中国所传的金刚界曼荼罗尤为接近,女尊像宜比定为金宝法羯四波罗蜜菩萨,但怖畏像等不易判定尊格属性。5. 部分佛塔四方雕造毗卢遮那立佛和三大菩萨,或与四方佛同时出现,这是密教在五方佛稍后形成的信仰系统。6. 部分佛塔的四方或四维方向出现了中国风格的四天王造像,应视为中尼佛教艺术传播与交流的结果。

本文把这些佛塔称为“佛塔曼荼罗”,意即以佛塔为核心的密教曼荼罗系统。以五方佛信仰为主体进行初步的讨论。我们把尼泊尔的佛塔曼荼罗视为从印度到中国的过渡地域,在这一视野中,可以发现许多富有深义的话题。比如,佛塔四方雕造佛像在印度的发展演变,以及他们如何与尼泊尔现存的这些造像衔接起来;尼泊尔不空成就佛与那伽龙王的组合,何以成为尼泊尔独有造像品类,是否具有特别的佛教义理;这些五佛信仰的造像以及印度的同类遗物,基本上都属于金刚界曼荼罗系统,那么,整体来看,善无畏所传的胎藏曼荼罗系统能否取得与金刚界并肩的地位实属疑问;尼泊尔四天王造像中的西方广目天王右手托塔,这在中国却是家喻户晓的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的形象,这提

醒我们四天王信仰分合移并的密教化进程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奥义。这些天王像都是中国风格的武士形象,受到了中国造像的影响。我们曾经详细研究过古印度佛像对中国的具体影响,却没有检得中国佛像影响印度的实例。四大天王像的发现,为中国佛教艺术回溯南亚地区提供了实物证据,惟其时代分布和地域分布目前尚无力扩展。

在印度重要的佛教遗址中,往往分布着许许多多的还愿塔,其中颇有雕造佛像的例子。在博物馆陈列的小型还愿塔之中,有一类是黑石宰堵波,多半认为是波罗朝的制作,多分布在比哈尔邦和孟加拉地区,四面雕造佛像。由于陈列的限制不便于四面观照,也是因为当初熟视无睹,没有予以重够的重视。所得四佛俱有实物照片的小型宰堵波,仅有三例。从其他资料所得也仅有一二例。中国也有类似的实物,数量也不多。久欲对此进行研究,疑郁于中,这次在尼泊尔对这类佛像曼荼罗也就特别留意。我们以考察所得图像资料为基础,一方面勾画了尼泊尔佛塔曼荼罗的基本特色,同时也尝试着对某些问题进行简单的论述,以此为个案推动中印佛教美术流变的探讨研究。佛教美术研究尚有很多艰深的领域,密教美术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图像资料和佛经文献的双重困境,有不少问题尚难得到确切的解答。

一 尼泊尔的佛教与佛塔信仰

尼泊尔既是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又是佛教艺术在喜马拉雅南麓的最后庇护所。阿育王在孔雀王朝的全盛时期,曾巡幸佛陀诞生地蓝毗尼(Lumbini / Lumini),在此竖立了著名的阿育王石柱,并在迦毗罗卫故城(Kapilavastu)附近的戈提哈瓦(Gotihawa)、尼格里哈瓦(Niglihawa)留下了另外二座石柱。这一事实说明,至少是以蓝毗尼、迦毗罗卫等地区为中心的尼泊尔南境,曾经是孔雀王朝的一部分。尼泊尔历史上的早期王朝李查维王朝(Lichhavi),也是由来自活动于吠舍离(Vaisālī,佛

尊涅槃地)一带的“离车族”所创建,他们推动了尼泊尔的佛教信仰和佛教艺术。在后来的尼泊尔历史中,尼泊尔往往与印度声息相通,其文化艺术多受印度的影响,现在仍然如此。就佛教而言,释迦牟尼经行教化之处,诸如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伽,这些被佛教徒尊之为四大圣地的广袤地区,都分布在今印度的比哈尔邦(Bihar Pradesh)和邻近的北方邦东部地区(Uttar Pradesh)。这里与尼泊尔南部包括蓝毗尼在内的泰莱平原一样,都位于古印度著名的北方商道(Uttarapatha)沿线,分布在殒达克河(Gandak)两岸,实际上可以视为同一文化地理。佛教艺术发展至密教时期,主要的生存地域集中在比哈尔东邻的古代孟加拉地区,即今天的孟加拉国和印度孟加拉邦。在公元12世纪末期和公元13世纪初叶的数十年时期内(超岩寺被毁于1203年,是佛教在印度消亡的标志性年份),盛行于孟加拉地区的密教僧侣和密教艺术为躲避穆斯林的杀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转入尼泊尔境内,在今加德满都谷地(Kathmandu Valley)一带生存繁衍,并强有力地影响喜马拉雅北麓的中国西藏。

详细研究尼泊尔的佛教史,无论是佛教教理的历史还是佛教造像的历史,都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就我们在尼泊尔考察的粗略印象看,尽管蓝毗尼作为佛陀诞生地而享有盛名,而在当地考古发现的佛教造像除了一件可能属于贵霜时期的红砂岩秣菟罗佛头外,其他造像的时代却并不很早。集中在尼泊尔国家博物馆、帕坦博物馆的佛教造像多在公元12-13世纪之后,也就是佛教在印度进入尾声之后。造像题材多为佛陀、观音、文殊、多罗和护法神,大抵与尼泊尔之北的中国西藏相似,以密教造像为特色,推想尼泊尔之南的古印度当年也曾经如此。加德满都西郊的斯瓦扬布大塔被认为是尼泊尔最伟大的古老佛塔,其形制以古老的覆钵式为主,以独特的塔顶方箱形平头为特色,藉此拉开了与印度佛塔的距离,建构了尼泊尔佛塔的独到之处,并成为尼泊尔诸多佛塔的原型。尼泊尔的寺庙建筑,多被称为baha / bahal,与见诸于迦德满都多卡广场、帕塔广场的王宫建筑或印度教神庙基本相似,多为砖木建筑,以多层屋顶和檐间斜撑(strut / tunal)为特色。自屋顶垂下的金属制的“天路垂饰”是尼泊尔独有的宗教建筑构件,在佛教寺庙,其

末端多浮雕佛教尊像,据当地人告知,这是导引亡灵进入天国的象征性表现。推想大概是西藏地区所谓“天梯”的原型,这个天国可能相当于中国内地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尼泊尔,据说还兼有长寿安康之意。而佛寺门前供养的多罗女尊,多居于立柱顶部,也同样是尼泊尔境外所殊为少见的。

尼泊尔盛行印度教,其声势远在佛教之上,尼泊尔帝王也以毗湿奴化身自居。在印度教的诸多流派之中,特别尊信毗湿奴一派,在博物馆收藏或神庙中供奉的印度诸神之中,毗湿奴造像犹为多见,其中有一尊供奉在帕坦的佛陀尼拉卡神庙(Budhanilakntha)中央水池的颇至独特的“卧姿毗湿奴”(这种形象的专名是Jalasayana Narayan),是印度教世界为数甚稀的圆雕造像之一。尼泊尔的毗湿奴信仰,却被冲霄雪峰阻留在喜马拉雅南麓,没有传播到中国西藏,但在尼泊尔却与佛教和谐相处。毗湿奴多供奉在大型庙宇中,例如位于加德满都与帕塔两地的杜巴广场(Dhoka Durbar Square)的毗湿奴神庙、巴德岗的旗古那罗延神庙(Changu Narayan Temple)。这些毗湿奴神庙内极少有佛教造像或佛塔。一些宏大的印度教神庙有“非印度教徒不得进入”的规定,佛寺却绝无这类自我闭囿的想法。加德满都的佛寺远不及印度神庙的数量之多,但庙域内随处可见印度教湿婆家族的神像。漫步在泰迈莱(Thamel)与杜巴广场周围的街巷,路边或沿街的居民院落之中,随处可见石雕佛塔。小型佛塔供奉尤为兴盛。街巷边也散布了有些属于印度教的造像,多为湿婆造像、灵伽造像、湿婆与帕尔瓦蒂双像、象头神造像,甚至看到了湿婆夫妇与佛陀雕刻于同一座造像碑,湿婆灵伽四侧雕造像佛像、佛塔与幽妮相组合等实例,却很少有幸看到毗湿奴造像。事实上,源于古印度的毗湿奴信仰本身就包含了浓郁的王侯气息,而湿婆信仰更加接近于基层民众。从两位大神的华丽王冠和蓬头散发的造像之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或许,以毗湿奴一派为主的印度教信仰多来自上层权贵,神庙邻于宫苑,造像拟于王侯,可能更多地体现了行政意志和权贵文化。而表现为佛塔供养形态的佛教信仰,却似乎更加得到普通民众阶层的亲睐,由此形成了数量极为繁多的石造佛塔,表现了平民意识,也具有更为宽弘的包融性。也或许可以这样说,权贵文

化多亲近于毗湿奴信仰,而平民意识多亲近于佛教信仰。究其原因,这毕竟是一个曾经诞生了佛陀的地方,而终究是印度教的边缘地带,在深层血脉和心理底基中,佛陀无疑与尼泊尔普通民众更加贴心。不过,这只是我们从庙宇和造像的实地考察中形成的粗略印象,尚需更加细致的研究分析。

尼泊尔的不同宗教共融并存,但相互之间没有改变对方的内在本质,这种现象称为“宗教同质性”。有不少神和佛,被佛教和印度双方都视为自己的膜拜对象,各自按自己的宗教礼仪加以供养,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对方的看法和做法。Lokesvara,世界之主、至尊之主,是双方共用的尊号,尼泊尔人用以称呼梵天、毗湿奴、观音,更多地用于后两者。圣地“佛陀尼拉卡纳特”(Buddhanilakantha)的“nilakantha”,原来是对湿婆的称谓(buddha在当地古语中意为“埋入地中”,nilakantha是“青色咽喉”之意),供奉的却是卧姿毗湿奴,而佛教徒也视之为观音的化身。甚至“斯瓦扬布纳特寺庙”(Swayambhunath Temple)的名称,也被认为是源于湿婆的别称,^[1]这座寺庙同样也是印度教教徒心中的“至圣之寺”。这是尼泊尔宗教特有的现象,对我们理解当地的宗教美术是相当重要的。

尼泊尔的佛塔建筑,最早可以追溯至阿育王时代,据迦毗罗卫故城附近的戈提哈瓦(Gotihawa)石柱铭文记载,阿育王曾在这里扩建拘留孙佛(Krakucchanda Buddha)的窣堵波;或者根据对铭文不同的解读,认为阿育王将此窣堵波扩建至双倍大小,或解释为再次扩建。无论如何,阿育王建筑窣堵波,可能是尼泊尔窣堵波建筑有文献记载的开端。以情理言之,尼泊尔的窣堵波还应该早于阿育王巡幸尼泊尔的时代,然而详细情况现在已难以得知。

在加德满都地区,通常认为帕坦杜巴广场外围的四座窣堵波是现存最古老的建筑。这四座窣堵波分布在帕坦皇宫广场外围东南西北的四个方位上,均为类似于印度桑奇大塔那样的覆钵形,分别命名为Traita、Lagan、Pulchowk、Ipi。东窣堵波距广场最远,约有500m左右,北窣堵波最近,约为200m左右。南窣堵波最大,覆钵直径为48.5米,其他三座窣堵波只有一半大小。关于这四座窣堵波的建造年代,国家博物馆认为可以追溯至阿育王时代,

为公元前3世纪,帕塔博物馆认为有可能是公元3-4世纪左右,后者可能更加可信一些。

接着,大约建造于公元5世纪的斯瓦扬布大塔与博拿佛塔(Bouddhanath)更为著名。而据艺术史学者诸如Percy Brown和Benjamin Rowland的看法,这两座窣堵波也可能追溯到阿育王时代。据结构示意图和现场考察分析,建筑主体仍然采用了类似于桑奇那样的覆钵式塔体,但在上方使用了一个方箱形的构件取代了印度式的平头(Harmika/Hermika),这个构件的四面都描绘了一双眼睛,象征佛陀全方位地俯视尘世苍生。再上方是13层的相轮,相轮之间的间距很小,整体上略呈圆锥状。在覆钵周围安置九龕供养五方佛和四波罗蜜,这些密教尊像的安置、供养以及象征,来自于印度东北部波罗密教艺术的影响,表明这些佛像是在窣堵波建筑存续了千年左右的漫长时期之后才添加的。立方体平头四面描绘眼睛的做法更晚,据尼泊尔国家博物馆的两件布质佛教绘画分析,绘于1515年的佛画上的斯瓦扬布大塔没有眼睛,而1637年的佛画上则醒目地描绘了眼睛。

两座著名大塔的建造时期正值李查维王朝(Lichhavi,公元4世纪末~公元8世纪)。这个王朝信仰印度教毗湿奴,也认同佛教信仰,创造了方箱平头的独特型制。这个时代遗存的佛塔更多的是整石雕造的小型窣堵波。按佛教的习惯分类,这些小型窣堵波都属于还愿窣堵波(Votiva Stupa,尼泊尔学者更加普遍地称之为“Votiva Chaitya”)。这些小塔,大体上由三部分构成:基座、覆钵、相轮顶饰,虽然覆钵是整座窣堵波的核心构件,但窣堵波本身附丽的雕刻和装饰才是当时关注和我们今天研究的焦点。基座通常较为高大,有的呈四方柱形状,四面雕造佛像或菩萨像,佛像或置于拱龕之中;有些基座为扁平的圆柱形,或一层或多层,部分窣堵波的圆柱体还置于方形石台之上。四方柱形塔身的窣堵波塔波,覆钵尤小,更加强调了窣堵波塔身及其佛像,Bhagawan Bahal与Dhwakhabahal两塔就是很好的例子。前者,我们有幸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该塔现存于该地的热戒大寺(Bikramasila Mahabihar),塔身雕刻了后笈多式样的四尊立佛,而佛像的肉髻呈尖锥状凸起,尼泊尔学者称为“约6-7世纪”,^{[1]38}约略近之;后者,据图像资料看,四面开

龕,龕內各雕菩薩像,其時代為“7世紀”。圓台形塔身的窣堵波,如來自加德滿都 Tekiu 的一件被稱為“漂亮的獨石窣堵波”的小塔,^{[2][4]}覆鉢下方由三層扁圓體組合而成,每層扁圓體周側都開龕造像,龕內造像已不存,外龕楣裝飾尤為華美。尼泊爾學者列舉了類似窣堵波的裝飾題材:人物、動物、植物、幾何裝飾、建築紋樣、天福之面、鵝、半神、緊那羅、天人乾闥婆、滿瓶、渦卷紋、摩竭魚、侏儒、支提圖像、雙鹿法輪等。李查維王朝的美術和建築被稱為“李查維式樣”,這些還願窣堵波是“李查維式樣”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李查維時代形成的這些還願窣堵波的基本形制,在后來的尼泊爾佛教美術史上被長期沿用,直到現在仍然基本如此。遍布街巷和廟宇聖域的還願佛塔,高度多在1米上下,大者近於等人身高。這些佛塔大致分為三個部分。基座多為方形,或是整體上為方形的多邊形,高層約為佛塔通高的1/3-1/2左右,多為一層,也有三層疊起的。中間為塔身,通常四面有佛像,多為坐佛。塔部相輪部,大多類似於斯瓦揚布大塔,由一個四方體和上面的圓錐形相輪構成,四方體的四面也多描畫一雙眼睛。這些佛塔絕大部分露天保存,仍然是尼泊爾頂禮膜拜的對象,發揮了佛教藝術原本應當具有的宗教功能。年代古旧的,如前舉的熱戒大寺的佛塔,多加鐵柵欄保護,但尼泊爾民眾似乎沒有多少文物保護的觀念,窣堵波上滿是信眾供奉的米粒、牛奶、鮮花以及紅色或黃色的顏料。年代較近的,甚至仍能看出斧鑿的痕迹,但其基本型制與裝飾仍與古旧之作相差無幾,充分顯示了佛教造像儀軌規範、技藝傳承及其內蘊的佛教義理的長期穩定性。

前舉諸塔,儘管四面各有尊像,但看不出尊像之間的內在聯系。李查維時代末期,印度的佛教轉向密教時期,特別重視所謂的曼荼羅供奉。曼荼羅固然是一個專門的佛教術語,但也可以寬泛地理解為一定數量的佛菩薩或其他神祇按一定的規則組成一個有機集群系統,以表現特定的佛教信仰。比較常見的是以佛塔為中心,並將佛塔視為法身佛遮盧遮那的象徵,並塔身四側雕造的四方佛,共同形成五佛曼荼羅。在尼泊爾,儘管還願窣堵波的基本型制仍然延續了“李查維式樣”,而塔身造像基本以五方佛取代了以前流行過

的各種裝飾。李朝以後,基本上是“佛塔五佛曼荼羅”一統天下的時代。

二 佛塔曼荼羅與五方佛信仰

1. 佛身四方雕刻四方佛

密教範疇的還願佛塔最明顯的特色是塔身四方雕造四方佛。這是以佛塔作為毗盧遮那佛的象徵,四方佛與之群組為五方佛,形成“佛塔曼荼羅”供奉。茲舉斯瓦揚布三例與帕坦一例作為“佛塔曼荼羅”的代表型像例。

第1例:斯瓦揚布的供奉石塔(圖1)

斯瓦揚布大塔是尼泊爾最為知名的佛教大塔,是尼泊爾最偉大的古塔,曾經作為尼泊爾的國家形象,成為2000年上海世博會尼泊爾館的設計原型。大塔四周及附近地區供奉了許許多多的小型石造小塔,造型和圖像配置都有細微的差別,惟所見資料都沒有這些小塔的編號、斷代、實測數據等詳細信息。這些小塔群,或以中國名稱謂之“塔林”,但內在本质不同。中國塔林多為僧侶瘞塔,而南亞多為還願塔。又,中國塔林多在殿堂式寺廟建築群之外另辟塔林,而南亞佛寺多以佛塔為中心,還願塔分布在主塔周圍。



圖1 斯瓦揚布的供奉石塔及北方不空成就佛

這座石塔位於大塔附近的入口處。整石雕造。下方為方形基座,其座上方是仰覆蓮座,蓮座下是大蛇環繞。塔身部分在四方各建四拱門,拱門各坐一佛。其上是覆鉢和相輪部,相輪部與斯瓦揚布大塔類似,而覆鉢則與喇嘛塔類似。本文關注的坐佛,鑄刻於塔東者,螺發,斜披袒右袈裟,袈裟略裹右肩類似於中國佛像中的“偏衫”,其他三佛與此略同。坐佛結跏趺坐,左手橫臥腹前托鉢,右手垂下置右膝前,掌心向內,施觸地降魔印(Bhumisparsa Mudra)。佛座左右兩端各有一頭大象,蹲伏,象頭朝外。據佛像儀軌推斷,此佛當為阿閼如來(Akshobhya),尼泊爾人視為五佛信仰中的第2佛。居

塔身南向者为第3佛宝生如来(Ratnasambhava),形象与前者略同,惟右手在右膝前,掌心向外,施与愿印。佛座前雕刻鞍鞞齐备的双马。居塔身西方者为第四佛阿弥陀如来(Amitabha),双手结禅定印,双掌托钵,佛座两端雕孔雀;居北者背后有龙冠,由5只眼镜蛇的头部拼合成扇形,右手举于胸前施无畏印。座位左右两端有金翅鸟,作跪姿人物造型,双手合什,背生双翅。此佛为北方不空成就佛(Amoghassiddhi),尼泊尔人视为五佛信仰中的第5佛。

第2例:斯瓦扬布的供养石塔(图2)



图2 斯瓦扬布的供养石塔及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

此塔也为独石雕造,基座宽大,而上方的佛塔较矮较宽,近于等边三解形。与前例不同的是,佛塔置于束腰须弥座上,在须弥座的四侧面各自开龕造像。佛龕的高宽相近,显得比较敦实。东方降魔印佛尊的佛龕保存更为完好。龕楣正中雕刻“天福之面”(Kritmukha,尼泊尔名之为 Chhepi),一种金翅鸟与那伽龙组合的图案母题:正中一金翅鸟,突出头的尖喙和双眼,两爪各持一蛇。佛龕左右是主柱及其顶上动物,可能是摩羯鱼。这种龕形装饰,尼泊尔称之为“陀兰那”。这个名称与桑门大塔的四座大门的名称相同,但除了名称之外,两者没有明显的承续关系。不过,这在年代稍早的印度波罗时期以及年代更晚的中国西藏地区,是经常出现的佛像背屏装饰。按《造像量度经》的看法,这些都是以谐音的方式表示六度教义的庄严母题。佛龕是这座小佛塔尤堪注意之处。龕内四佛,坐姿大体相似,也都是左手托钵的禅定姿势,右手印相各异,佛座表示也有区别。居东者阿閼如来结触地降魔印,基本上是一个简洁的方形台座;居南者宝生如来施与愿印,莲座刻画极明晰,四瓣的莲肉部特别丰润;居西者阿弥陀如来结禅定印,低矮莲座,佛衣在双腿中间呈扇形铺开;居北者不空成就佛施无畏印,佛坐为低矮的覆莲,居中部位有布巾呈倒锥形垂覆。

第3例:斯瓦扬布的供养石塔(图3)

此例,与前例相比较,整体结构有相通之处。

佛塔座落在形体很大的方形基座上,塔身置于仰莲座之上,塔座呈方柱体结构,四周各雕坐佛。佛顶上方再雕仰覆莲座,置覆钵与平头,覆钵四周各开龕造佛,这一部分仿佛是前例的缩略版。方柱形塔身特别引人注目。四方各造一佛,均结跏趺坐,左手横卧腹前托钵,右手印相各自不同。四佛胸膛宽阔,意在强调厚实的胸膛与慈悲的佛相。佛面圆满,微微前俯,双耳垂于肩,肉髻分为上下两层。头光周缘有放射状的短线纹,可能表示佛光照照。居东者阿閼如来结触地降魔印,居南者宝生如来施与愿印,居西者阿弥陀如来结禅定印,居北者不空成就佛施无畏印。四周坐于莲座上,无乘物。上方覆钵部四面龕中各有尊像,均结跏趺坐,项光身光俱全,其一作禅定印,其一两手在胸前握持袋状物,可能跟财富有关,另外两尊的手印与说法印类似。这四尊小像,难以判断具体尊格,也不易看出他们与下方柱身上的四尊大像之间的对应关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推断,柱身四尊大像才是主要的膜拜对象。我们仔细考察过塔体结构与造像配置的这类还愿宰堵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在百座以上,十之八九在塔体四方雕刻四方佛,由此不难看出四方佛雕刻和信仰的普遍性。



图3 斯瓦扬布的供养石塔



图4 帕坦博物馆藏铜塔

第4例:帕坦博物馆藏铜塔(图4)

前举三例,都是我们考察所见,缺少详细的诸

如尺寸、材质、年代等基本信息,为弥补这一不足,兹据《帕坦博物馆指南》(Patan Museum Guide)^{[4]146}著录的一件小塔作为补充。这件被题为“Shikarakuta (Small Temple) Chaitya”的小塔,高仅17.3cm,铜合金,镀金,造于15-16世纪。造型大体上与前举第二例更为接近,须弥座侧面的佛龕也是尼泊尔陀兰那造型,装饰母题也约略相似。佛龕高大,大部分升起于须弥座上方,龕内也分别铸有阿閼如来等4佛。从《指南》的编辑体例,可见这是5佛信仰的重要物证之一。该馆的展览说明云:

这个制作精致的像神庙的支提,毫无疑问,是一个寺庙或家用圣所。这个支提附丽于这个装饰精美的神庙样式的建筑之上,有一个两层基座排列成一个20个角的曼荼罗。每个上部龕室具有一个小型的可以移动的精彩的佛陀。在突出的塔门中间的每个角上是半鸟半人的神话人物紧那罗造像。挨着九重相轮的尖顶饰,是一个镶着彩色珠宝的盾形饰板,对应于下面龕室内的佛像。顶部的珠宝,是一个水晶,表现了佛陀的头顶的肉髻。在相轮部尖顶的旁边有一对环,很可能曾经插入一个圣洁的华盖。

据我们曾在博物馆的仔细考察,四侧佛龕的佛像也是与前举各例相似的阿閼如来、宝生如来、阿弥陀如来、不空成就佛,形姿与手印等方面也秉承了惯用的程度:这表明,类似的佛塔与佛像的复合体,作为隐寓了宗教精神的物质遗存,证实了尼泊尔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的佛教信仰保持恒定发展。

2. 佛塔四方佛属于金刚界曼荼罗系统

以上四例,四方佛造像基本相似,左手均托持佛钵,右手印相各自不同,仅第一例有明显的乘物。以上四尊坐佛,与大日如来并称五佛,是密教时期

典型的礼拜对象。这些造像中都没有出现大日如来。佛塔被视为大日佛的象征,在大日佛的周围拱侍四方佛,以此表达五佛信仰。这里仅举一例佛经文献以明之。

不空译《金刚顶瑜伽三十七尊出生义》叙述金刚界三十七尊均由大日如来流现,以佛塔为中心,依次展开:“由大圆镜智,厥有金刚平等现等觉身,则塔中方东阿閼如来也;由平等性智,厥有义平等现等觉身,即塔中方之南宝生如来也;由妙观察智,厥有法平等现等觉身,即塔中方之西阿弥陀如来也;由成所作智,厥有业平等现等觉身,即塔中方之北不空成就如来也”。所有的一切“出于大日如来善巧业用门。故此宰堵婆,可谓总领一乘之秘旨,何况权实之道于是全焉”。这里分明是以佛塔为中心展开金刚界曼荼罗的,这个中心的主宰就是大日如来,佛塔就是他的象征。在密教图像中,大日的三昧耶形就是宰堵婆。尼泊尔佛塔,恰好真切地体现这种密教世界的构想。^[3]不空(705-774,梵名阿目佉跋折罗 Amoghavajra,华言不空金刚)生活于公元8世纪的开元年间,而尼泊尔的这些佛塔普遍很晚,帕坦博物馆藏像造于15-16世纪,其他的更晚,甚至有不久之前的新制作。这说明,不空译经中表述的金刚界密教思想,在尼泊尔流行千余年之久却没有太多的变化。

这样的判断,已基本成为共识,尼泊尔各博物馆等部门意见是共同的。据《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佛教收藏》^{[2]35-37}的详细说明,五佛特别受尼泊尔信众的厚爱,以大日为第1佛,顺次至北方不空成就佛为第5佛(图5)。尼泊尔的五佛信仰有一部分尼泊尔自我发展的特色。五佛的形象特征,诸如方位、乘物(Vahana)、手印,总结如表1:^[4]

表1 尼泊尔五佛

		如来名	乘物	手印	色
一	中	毗卢遮那如来 Vairocana	狮子	Dharmacakra Mudra 说法印	白
二	东	阿閼如来 Aksobhya	象	Bhumisparsa Mudra 触地印	青
三	南	宝生如来 Ratnasambhava	马	Varada Mudra 与愿印	黄
四	西	阿弥陀如来 Amitabha	孔雀	Dhyani Mudra 禅定印	红
五	北	不空成就如来 Amoghasiddhi	金翅鸟	Abhaya Mudra 无畏印	绿

倘若参照中国密教所传的胎金两部曼荼罗的五佛,其方位、印相、乘物等造像特征,在各自的主要典籍都有所记录,金刚界佛典的记录尤为详细,

兹举2例:

大唐南印度三藏金刚智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卷一“如下所说皆想从毗卢遮那佛身中出

现,又想四面。毗卢遮那佛,以诸如来真实所持之身,及以如上所说一切如来师子之座而坐,其上毗卢遮那示久成等正觉……于其东方如上所说象座,想阿閼鞞佛(Aksobhya – Buddha,阿閼佛的异译)而坐其上。于其南方如上所说马座,想宝生佛而坐其上。于其西方如上所说孔雀座,想阿弥陀佛而坐其上。于其北方如上所说迦楼罗座,想不空成就佛而坐其上”。又,卷三:“安立本契。阿閼鞞名触地契……宝生名授所愿契……无量寿名胜上三摩地契……不空名施无畏契”。经文中的契,是今语手印的异译,这4种契印即今语所说的触地印(触地降魔印)、与愿印、禅定印、施无畏印。



图5 尼泊尔国家博物馆陈列五佛示意图

宋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明教大师臣天息灾奉诏译《一切如来大秘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拏罗经》卷五《铃杵相分出生仪则品第六》:“佛三界尊毗卢遮那如来,白色如满月相,顶戴宝冠着红衣,最上微妙一切庄严,于金刚师子座上作金刚跏趺之坐。东方阿閼如来大青宝色,其面圆满犹如秋月,相好具足着妙青衣,光明无数照于一切种种庄严,左手作金刚拳安髀上,右手作触地印,面东坐象座一切庄严。南方宝生智自在佛,身如日色面如满月,顶戴宝冠着黄白色衣,面向南坐,左手作金刚拳安髀上,右手作施愿印,乘一切普遍智莲花王宝马之座。西方无量光如来,身黄金色面如满月,作入三摩地相,发髻严好头冠庄严,身着红衣背月轮光,回面向西坐忿怒明王座。北方不空成就如来,身绿色面如满月,光明晃耀现微笑容,发髻严好头冠殊妙,着青色衣种种庄严,左手作金刚拳安髀上,右手作说法相,坐大宝莲花金翅鸟王座”。其造像特征总结如表2。

表2 中国所传胎藏两部曼荼罗五佛

胎藏界曼荼罗			金刚界曼荼罗		
		契印 ^[5]	乘物	色彩	乘物 方色
中	①毗卢遮那	法界定印	①毗卢遮那	智拳印	狮子座 白
东	②宝幢如来	与愿印	②阿閼	触地印	象座 青
南	③开敷花王如来	无畏印	③宝生	与愿印	马座 黄
西	④无量寿如来	阿弥陀定印	④阿弥陀	禅定印	孔雀座 红
北	⑤天鼓雷音如来	触地印	⑤不空成就	无畏印	迦楼罗座 绿

参照上表所记诸佛的方位、契印和乘物等造型特征分析,尼泊尔流行的佛塔曼荼罗诸佛,明显与胎藏界曼荼罗不符,应当属于金刚界部类或接近金刚界系统。喜马拉雅的另一侧,“在藏传佛教密教中,基本是以金刚界五佛为核心”。^{[7]31}元时的八思巴也有类似的想法。他把五台山完全看作是金刚界曼荼罗,以五台为五方佛之生灵座:“中台如雄狮发怒逞威,山崖像白莲一般洁白;东台如同象王的顶髻,草木像苍穹一样深邃;南台如同骏马卧原野,金色花朵放射出异彩;西台如孔雀翩翩起舞,向大地闪耀月莲之光;北台如大鹏展翼,满布绿玉一般的大树。”^[8]在这篇为忽必烈消灾祈福的《赞颂文殊菩萨——花朵之鬘》的文字中,接着把这五座台明确地与大日如来等五方佛逐一对应起来。现在看来,五方佛或乘物、方色,都属于上表所示的金刚界曼荼罗系统。由于八思巴的声望和影响,五台山也由此成为藏传密教徒极为向往和朝礼的圣迹。实际上,五台山,在当时尼泊尔人的心目中,甚至也压倒了释迦牟尼在尼泊尔和印度的其他圣地。

通常认为,藏传佛教与尼泊尔的关系密切,而且,曾经流行东印度孟加拉地区的密教,在遭穆斯林劫掠之际,有许多僧人避入尼泊尔,也有假途尼泊尔进入中国西藏地区的。由此推断,尼泊尔流行的密教信像以金刚界五佛为核心,应当是符合历史真实的。^[9]

3. 四维明妃的尊格判定

在佛教典籍中,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称为“四方”,东南、西南、西北、东北称为“四维”。在斯瓦扬布大塔四维位置的佛龛,分别供奉了四方佛对应的配偶神般若女尊造像(Prajnas),并在佛龛边上铭记尊名。从东北方位起,分别是:

东北:佛眼明妃 Lochana / Saptalochani,阿閼佛

东南:摩摩枳明妃 Mamaki / Mamaki Tara, 宝生佛

西南:白衣明妃 Pandara, 西方阿弥陀佛

西北:多罗明妃 Tara, 不空成就佛

上記尊名,以尼泊尔学者提供的示意图为基准,在斜线后附记了塔体铜牌上书写名字。四佛的女尊,诸书有不同的记载,这是尼泊尔学者认可的一种。从佛家的顺时针右旋礼仪看,我们首先礼拜的反而是四方佛的女尊像。

尼泊尔认为的大塔周边的四维配偶神,即中国所传胎金二界的四明妃。在胎藏界曼荼罗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是所谓“中台八叶”,由毗卢舍那如来与宝幢如来、开敷华王如来等五佛与普贤等四菩萨构成,端坐于一朵大莲花的花蕊和花瓣部分。大日如来面西而坐。再外一层是遍知院、莲花部院(观音院)、金刚手院、持明院,内供四佛母,通常出现在中国和日本佛教美术中的,分别是:佛眼(Buddha-lo-cani)、圣观音菩萨(Aryavalokitesvara)、金刚萨埵(Vajra-sattva)、般若菩萨(Dhara-ni)。^{[5] 45, 61-62, 128, 188}

实际上,胎藏界曼荼罗的图位,说法极不一致,普通地说,按依不同的典籍,至少还有以下三种的不同:(1)经疏曼荼罗,出《大日经》(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 no. 848)与《大日经疏》(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 no. 1796);(2)阿闍黎曼荼罗,出善无畏自己撰写的《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入莲华胎藏海会悲生曼荼罗广大念诵仪轨供养方便会》(简称摄大轨, No. 850)、《大毗卢遮那经广大仪轨》(亦名大悲胎藏,简称广大轨, No. 851);(3)现图曼荼罗,实际上是在经文系统之外流传的图样,^{[10]16-18}即现今流布较广的图位,也即上举以上是比较通行的说法。实际上,这种提法仅仅是比较通行而已。同时,这种情况也表明,善无畏所传的大日经胎藏界曼荼罗还有诸多不完备的地方,这一系统实际上被稍后兴起的金刚顶经所替代,因而印度殊少大日经经典及相关遗物。^{[10]131}

四佛与四明妃的对应关系,向来是纷繁复杂的。大体上有胎金两大部类。上述是胎藏部。在中国所传的另一类金刚界曼荼罗,以不空译《金刚顶经》为基础。以五佛为中心,各居月轮之中。五大月轮各称为部,各部及部主,分别为如来部主毗

卢、金刚部主阿閼佛、佛宝部主宝生佛、莲花部主弥陀佛、羯磨部主不空佛,各有女尊随侍。比如,北方羯磨部即“金刚界五大月轮中,北方名羯磨部。为众生垂慈悲成种种事业之部分也。佛为不空成就如来”(丁氏《佛学大辞典》)。按照《一切秘密最上名义大教王仪轨》卷上“十方三世一切佛,毗卢遮那一佛摄”的观点,不仅四方佛是毗卢遮那的流化,其他菩萨天众也是毗卢遮那佛的流化。北方的羯磨波罗蜜(Karma-Pāramitā),按《佛学大辞典》的解释:“羯磨波罗蜜,住于金刚界曼荼罗中央如来北方之尊,密号曰妙用金刚,或曰作业金刚,四波罗蜜之一。大日如来之侍女也。《圣位经》曰:‘毗卢遮那佛于内心证得羯磨金刚大精进三摩地智,自受用故,成羯磨波罗蜜形,住于毗卢遮那如来左边月轮。大日如来入北方释迦如来三摩地,出生此波罗蜜。’”密教所谓的“波罗蜜形”或省称“波罗蜜”,即女形尊像也,羯磨波罗蜜(Karma-Pāramitā)即女尊羯磨金刚女(Karma-vajra)。其他的萨磨金刚女(Sattva-Vajra)、宝金刚女(Ratna-Vajra)、法金刚女(Dhamma-Vajra),大致也是如此。此四女,合称四波罗蜜。《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卷上谈到金刚智所传金刚界法,其说有五部:“一佛部,毗卢遮那佛以为部主,四波罗蜜菩萨以为眷属;二金刚部,阿閼佛以为部主,四大菩萨以为眷属;三宝部,宝生佛以为部主,四大菩萨以为眷属;四莲华部,阿弥陀佛以为部主,四大菩萨以为眷属;五羯磨部,不空成就佛以为部主,四大菩萨以为眷属。内外供养及四摄,成三十七”。这更是明确地说,金刚界法由五佛为核心,四波罗蜜是毗卢遮那佛的眷属。《付法记》卷上末题“巨唐大和八年(公元834年)岁在甲寅仲秋月二十日净住寺梵字传教沙门海云集”,这个年代题署,说明,中国唐代“开元三大士”翻译密典及稍后相当长的时期,尚没有四方佛明妃的概念。

闍宾三藏般若奉诏译《诸佛境界摄真实经》卷中“金刚界大道场品之余”:“东北角金刚波罗蜜天,属阿閼如来……复次东南角宝波罗蜜天,属宝生如来……复次西南角法波罗蜜天,属无量寿如来……复次西北角羯磨波罗蜜天,属不空成就如来”。般若,唐代译经僧,转载《宋高僧传》卷二,译经于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约晚于金刚智等人60

年。这只是把毗卢遮那佛的四波羅蜜菩萨分散改隶于四方佛,还谈不上明妃的概念。不过,明妃的概念,就是从这里起步逐渐形成的。

明妃概念的真正的定型,年代较晚,在中国直至北宋施护(? - 1017)译《一切秘密最上名义大教王仪轨》和其兄天息灾的译经才有明确的解说,古印度可以稍早一些,大致为四方佛与上述四女尊对应。西天译经三藏传法大师赐紫沙门臣施护奉诏译《一切秘密最上名义大教王仪轨》(北宋初期)卷上:“秘密四印若相应,能作相应语悉地。地水火风四大种,即是所说四密印。四印平等若相应,四种明妃皆合集。佛眼菩萨为地大,摩摩枳尊为水大。白衣菩萨为火大,多罗菩萨为风大”。经文稍后提到地水火风的方位,可知以上四尊分别对应于东西南北。这很可能就是斯瓦扬布大塔四维尊名的来历。

那么,四方佛与其明妃,在中国大体上有胎金两类理解:胎藏界:佛眼、摩摩枳、白衣、多罗;金刚界:萨埵金刚女、宝金刚女、法金刚女、羯磨金刚女。^[11]从这种看法出发,重新审视斯瓦扬布大塔五佛四女尊像,我们认为:(1)此塔以东向为尊,大日与阿闍同居东方,接近金刚界系统。(2)此塔仅有大日等五佛,与金刚界系统的造像仪轨相符。(3)上文已经论述的尼泊尔五佛信仰的金刚界倾向。(4)尽管古印度一些零星的胎藏系文物,尚不足以改变以上的总体态势。

如此说来,斯瓦扬布大塔基本上是按照金刚界系统的仪轨布置尊像。那么,四维女尊宜识别为金刚界四金刚女,即:萨埵金刚女、宝金刚女、法金刚女、羯磨金刚女,她们是四方佛对应的四明妃。

相比较而言,胎藏界曼荼罗结集的佛菩萨与来自印度教的天部神,数量特别多。而金刚界曼荼罗大体上以五佛为基础,以37尊像构成的曼荼罗为基本形态,虽然证据不太充分,大体可以认为这是佛在吠舍离宣说的“三十七觉支”的神格化。金刚界曼荼罗不仅仅在中国和东亚更为流行,已发现的古印度密教遗物也多表现为金刚界曼荼罗的特征。按我们的理解,斯瓦扬布大塔及前举诸例以及更多的佛塔遗存,说明尼泊尔流行的可能也是金刚界曼荼罗或者是接近于金刚界曼荼罗的密教系统。斯

瓦扬布大塔四维尊像,也应当相应地理解为金刚界曼荼罗四明妃。

关于五佛信仰,就我们所知的关于方位、印相、持物之类造像特征的总列,如印度孟买新月博物馆(Chhatrapati Shivaji Maharaj Vastu Sangrahalaya)的陈列图表、印度学者巴达恰利亚(B. Bhattacharyya)依据梵文《成就法鬘》列举的五佛系统列表,^[12]尼泊尔学者Jnan Bahadru Sakya的图表“禅佛的符号和特征”(Symbo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hyana Buddha),^[13]⁷⁶以及前举尼泊尔国家博物馆、帕坦博物馆等陈列图表,都是基于金刚界五佛而言的,尚未在印度和尼泊尔看到有关胎藏界五佛的造像学特征的系统描述。

尽管我们认为斯瓦扬布四维尊像应识别为金宝法羯四金刚女,但也不敢自以为必是。因为我们对尼泊尔佛教美术知之甚少,另外,与尼泊尔佛教造像密切相关的印度波罗期密教造像发现尚少;印度后期流行的诸如《成就法鬘》之类也没有相应的汉译本,我们对藏文佛典由于语言的原因也无从仔细查阅;再加上斯瓦扬布当地条件所限,对造像本身也缺少系统的深入考察,因而,这只能作为我们的初步看法,与尼泊尔毗邻的中国西藏地区的密教造像还有待于更加充分的研究,斗胆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或许可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4. 塔身四方雕刻五方佛

佛塔信仰,是原起于追忆释尊而仿照王者陵墓建造的纪念性建筑。但这种形制的建筑起初并不专用于佛教,自阿育王兴建84000窣堵波后,才逐渐成了佛家专属的象征。在经历了公元初期的佛像兴起、大乘佛教的有神论倾向、多神教色彩浓郁的密教信仰的历史长河中,逐渐由单一的纪念性质的佛塔发展成为佛塔及其四方佛像共同构成的象征佛教奥义的复合体。这种情况的尊格,在大乘佛教时期,依旧主要以释尊为主,但从大乘末期与密教初兴时期开始,除了释尊信仰外,至密教晚期还特别流行其他本尊体系的信仰,佛塔也由此形成了法身佛或本初佛(Adi-Buddha)的象征。密教基本概念的本初佛理论确立后,特别流行在佛塔的四方配置五佛,现存典例实例以斯瓦扬布大塔为代表。

斯瓦扬布(swayambhu)这个名字,据《斯瓦扬布往世书》(Swayambhu Purana,或译“自生往世书”)的解释,义为自我创造,因此,这座大塔也被称为“the Self - Created (swayambhu) Stupa”。这大概是尼泊尔的共同看法:“金刚乘佛教所说的斯瓦扬布佛就是本初佛。本初佛,或者说是原始佛,诞生于莲花放出的蓝色火焰之中,被说成是无限的、自我创造的,是无始无终的。本初佛也被认为是五禅佛的合一。本初佛无形无象,通常以禅定佛亲密拥抱他的般若(沙克蒂)的形象出现在雕刻或绘画之中。”另一本专门简介尼泊尔佛教图像学的小册子,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接着声解释说:“在尼泊尔,斯瓦扬布被作为本初佛加以崇拜。”^{[13]30}

中国学者的看法,例如:佛光山《佛光大辞典》“本初佛”:梵名 ādi - buddha。即本初之佛,乃最原始、最根本之佛。印度之后期密教金刚乘(Vajra - yāna)认为,本初佛系诸法之本源、万物之创造者,并有五禅佛(Dhyāni - buddha)亦由此佛所流出之说。据梵文《大乘庄严宝王经》(Kāraṇa - vyūha)之别本记载,於劫初出现本初佛、自生者(Svayambhū),或本初主(ādi - nātha),依禅定而创造世界,又自其精神而产生观自在菩萨(Avalokiteśvara)。又由此菩萨两眼生出日月;由额生出大自在天(Maheśvara);由肩生出梵天;由心脏生出那罗延天(Nārāyaṇa);由牙齿生出辩才天女(Sarasvatī)。据梵本《自生富兰那》(Svayambhū - purāṇa,自生往世书)记载,本初佛最初即以火焰姿态出现於尼泊尔;文殊师利菩萨为保存此火焰,而建自生支提(Svayambhū - caitya,自生塔)。本初佛之思想,在西历第十世纪以後,为了统合五在定佛之思想,而兴起於那烂陀寺之学僧之间。至後世,为尼泊尔艾斯伟力卡派(梵 Aivarika)、西藏喇嘛教等,采用为教义。另外,《佛教图像说》抄引了上述解释之后,紧接着说:“藏传佛教以普贤王如来为本初佛,他的形象和释迦如来大体相似,但不穿袈裟,全身是青色,裸体,多数还是双身,拥抱一位白色的明妃,在唐卡和壁画中多见。”^[14]

斯瓦扬布原是梵天的一个尊号,在印度教神话中,梵天出现于虚空空茫之中(相当于老子说的“无

中生有”),然而由他创造了万物。梵天是万物之祖。这个意思被引入佛教信仰后出现了本初佛。本初佛也是一切众佛以及一切万现得以存在的前提,他与大日如来更有探本求源的性质。斯瓦扬布大塔自身被看作是本初佛的象征,曾经流行的至上尊神号称遍照无碍的毗卢遮那大日如来反而屈居旁侧。本初佛是印度佛教最后阶段的产物,因而大塔的象征意义及周围供奉五佛的做法,都应当出现于公元12-13世纪的一段时期。尽管有碑铭可以证实大塔出现于公元5世纪,而现今形态却是很晚才形成的。

这座极著名的斯瓦扬布大塔保留了早期覆钵式大塔那样的基本形制,以一个巨大涂成白色的覆钵式塔体为中心。覆钵周围安置了九座大型佛龕(图6-7),外贴铜皮,铜金,在白色塔体的映衬下,显得特别的富丽堂皇。这九座大型佛龕,犹如九座佛殿,分别供养五佛和四明妃。位于东方的主供是阿閼如来佛与大日如来佛,阿閼佛居主佛,大日的佛龕反而稍小。其他的南西北三方,分别是宝生佛、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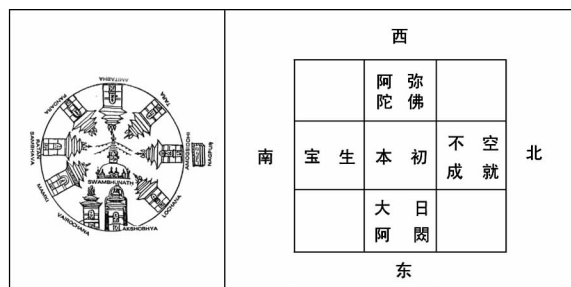


图6 斯瓦扬布大塔周围尊像配置示意图

尼泊尔佛教美术中的五佛图像,大多数如同上举的佛塔曼荼罗诸例,主尊大日如来用佛塔表示,并没有表现出具体的人格化形象。所见五佛俱全的图像很少。加德满都泰迈莱地区的热戒大寺,佛寺主殿门楣上镶嵌一方五佛铜版浮雕(图8)。这五尊佛像从左到右,按照以下顺序排列:③宝生佛——②阿閼佛——①大日如来——④阿弥陀佛——⑤不空成就佛。各佛的印相与前举佛塔及佛经文献依据相符,均坐于莲花座上,莲茎向中间并扰,形成并蒂五莲的形式,可能是基于舍卫城大神变图像演化而来的。中国佛教寺院也有类似的

横列式五佛,多见于宋元古刹遗构,也是按照上述③②①④⑤的次序排列的。^[15]而见于东印度波罗时期的五佛和尼泊尔雕刻匠师正在雕刻的五佛,五佛的排列次序略有不同,前者的排列次序是⑤②①③④,后者为④②①③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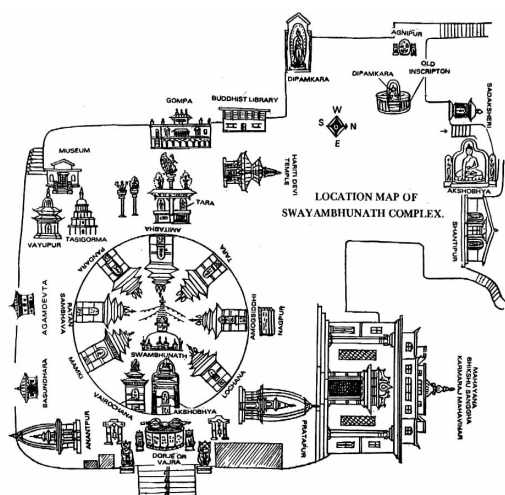


图7 斯瓦扬布大塔平面图



图8 热戒大寺佛寺主殿门楣五佛铜雕

不过,总体来看,大日如来的人格化表现是相当少见的,尼泊尔更加流行四佛信仰。“五佛组合佛塔,在实际情况中,四方佛皆以雕塑形式分置塔外四壁的龕中,各朝一方,多数情况下被妆以各自的标志性色彩,宰堵波的塔身就代表其他四蕴之总、中央的大日如来,公元8世纪波罗王朝早期、约当金刚乘初创之时,建于那兰陀寺的宰堵波就是典型代表。不过,在尼泊尔,大日如来也作为偶像之一出现”,^{[7]34}斯瓦扬布大塔即其一例。实际上,就法显和玄奘的求法记录分析,古印度更加流行的也是四佛信仰,这可能对尼泊尔佛教也产生了影响。

尼泊尔有许多模仿斯瓦扬布的佛塔,其中位于加德满都杜巴广场附近的 Kassi - Swoyambhu Shree Gha 也在覆钵周围建造了佛龕供养五方佛,配置、方位等与斯瓦扬布基本相似,惟缺少四维的女尊龕像。在大型佛塔中供养四女尊的,我们仅见此例。另一座也同样极有名的博拿佛塔,仅把佛塔基座制作成多边形的坛场形状,却没有五方佛供奉。(待续)

参考文献:

- [1] 罗伯尔·萨耶. 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M]. 耿昇,译.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 115.
- [2] National Museum of Nepal. *Buddhist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epal*[M]. Chhauni 1998: 38.
- [3] 乾仁志. 金刚界曼荼罗と仏塔[J].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 1993(1): 119 - 123.
- [5] 全佛编辑部. 密教曼荼罗图典·二“胎藏界”:上册[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0 - 30.
- [6] 全佛编辑部. 密教曼荼罗图典·三“金刚界”:上册[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2 - 66, 86 - 89, 111 - 113, 135 - 137, 160 - 162.
- [7] 杨清凡. 五方佛及其图像考察[J]. 西藏研究,2007(2): 31 - 34.
- [8] 吕建福. 中国密教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584.
- [9] 吉崎一美. カトマンズ盆地におけるマンダラの成立根拠としての〈壺〉[J].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97(1): 326 - 319.
- [10] 全佛编辑部. 密教曼荼罗图典·一“总论·别尊·西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6 - 18.
- [11] 松長有庆. 四金剛女と四明妃[J]. 『胜又俊教博士古稀記念論集・大乘仏教から密教へ』,春秋社,1981: 130 - 131.
- [12] Benoytosh Bhattacharyya.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Based on the Sadhanamala and other Con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M]. Calcutta, 1924: 32.
- [13] Jnan Bahadru Sakya, Short Description of Goods. *Goddesses and Ritual Objects of Buddhism and Hinduism in Nepal*[M]. Kathmandu, 2002:76.
- [14] 弘学. 佛教图像说[M]. 成都:巴蜀书店,2009: 79.
- [15] 李鼎霞,白化文. 佛教造像手印[M].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234.

责任编辑:李珂